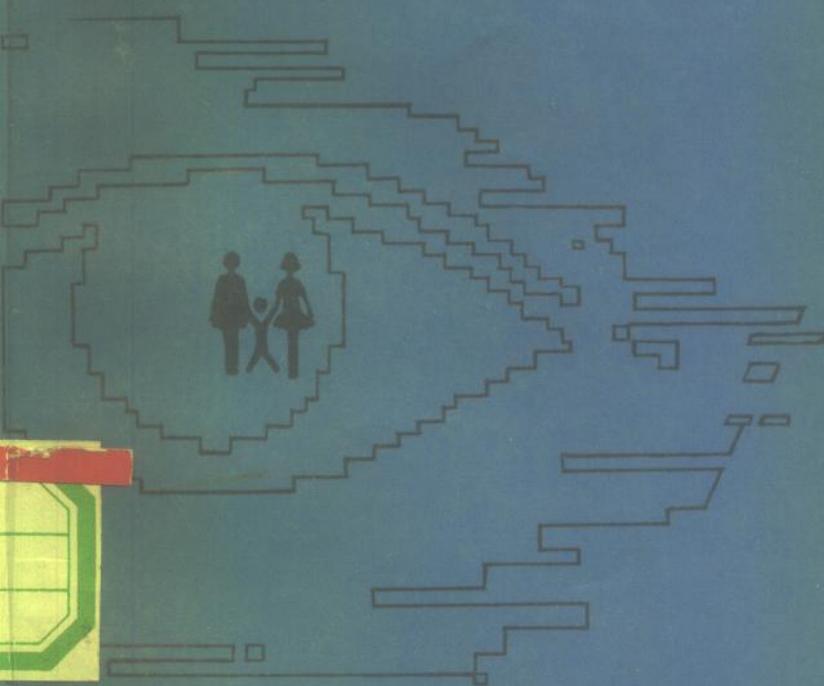


顾宝昌 编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

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

PERSPECTIVES OF
SOCIAL DEMOGRAPHY



商务印书馆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

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

顾宝昌 编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SHÈHUIRÉNKǒUXUÉ DE SHIYĚ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
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
顾宝昌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53-8/F·151

1992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0千

印数 0—2 200 册 印张 12 %

定价：5.60 元

目 录

序言	顾宝昌	(1)
再序	顾宝昌	(5)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田心源	(7)
社会学和人口学	摩尔	(13)
社会人口学：一个挑战	戈兹切德	(44)
人口概念释析	赖德	(64)
人口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进展	纳姆	(91)
人口行动的结构	伯奇	(104)
人口转变理论再思	科尔	(122)
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	泰特尔鲍姆	(143)
社会结构与生育率：分析框架	戴维斯、布莱克	(159)
生育率中间变量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	邦加茨	(197)
生育分析的经济学框架	伊斯特林	(222)
生育下降的理论：重新评价	弗里德曼	(249)
生育率下降的财富流理论	考德威尔	(270)
论死亡率	北川	(293)
迁移理论	李	(311)
理论知识能否改进人口预测	凯菲茨	(329)
人口政策：政府的作用	德莫尼	(363)
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发展中国家		
社会分层的影响	默顿斯	(380)

序 言

选译《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一书的念头源自我留学回国以来的感受。我于1986年夏天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获取社会学和人口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两年来先后为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社会人口学和人口学概论等课程。我在教学中的意图之一，是希望能把我在国外学到的人口学知识尽可能地传授给学生，即希望能多介绍和讲授一些国外人口学近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但要做到这一点，苦恼的是没有合适的教科书。国内这些年出版了一些人口学教科书，并且越出越好，但难以完全与我的上述意图相吻合。同学们虽然学习兴趣很大，但阅读英语原文的能力毕竟还不能与阅读中文同日而语，因此，在课堂上花费了许多时间来讲解本来同学们可以通过课下阅读去理解的内容，使课堂讨论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展开。这是很令人遗憾的。最理想的当然是能尽快写出一本符合教学意图的社会人口学教科书，但这也不能一蹴而就。这样，就萌发出一个选译一批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国外社会人口学论文，组成一集出版的想法，至少可以作为人口学课堂教学的参考书，急一时之用。

这些年来，随着人口学的研究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国外人口学已有不少引进和介绍，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这些引进和介绍，大多集中在方法方面，如人口分析技术和计算方法等等，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对国外人口学在理论方面的研究，或者确切地说，对国外人口学的“思路”的介绍，却较少、较弱。不管造

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种偏差是不应该有的。综观第二次大战以来人口学在世界上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分析研究手段、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计算机的应用方面，而且表现在充分利用人口学作为一个多元交叉学科的特点，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现象和人口行为进行深入的多侧面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和系统的见解。我觉得，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学学术园地中的一个后起者，对国外人口学的引进和借鉴，不仅应在方法方面，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思路”方面。我觉得在这里用“思路”而不是“理论”，更能表达我的意思。因为一提“理论”，往往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最终的结论，而我觉得更应该着力关注的是国外人口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是怎样去得出这些结论的，他们是怎样考察人口现象的，和为什么要从这些角度去考察。我这里所说的“思路”，是指英语里的“approach”；书名中所谓的“视野”，是指英语里的“perspective”。我以为，了解国外人口学的“思路”和“视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比对某些具体方法的掌握更为重要，对于当前人口学在我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更为关键。道理很简单，人口方法从来就是为了人口研究的需要，为了实行对人口问题的考察而应运而生，并不断变化的，舍此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天下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任何方法都是因时因地因课题而异的。缺乏对研究思路的了解，而孤立地去掌握方法，那么在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上难免会生搬硬套而出现偏差，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肯定地说，对于“思路”的了解和认识会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研究方法的正确掌握，弄清这些方法的来龙和去脉，弄清它们的功能和缺陷，才能举一反三、不断创新，成为方法的主人。

人口学学科分支繁多，体系庞杂，但大体可分为形式人口学（Formal demography），也有的认为应译为规范人口学，或正规

人口学) 和社会人口学 (Social demography) 两大领域。简单地讲，形式人口学主要研究人口变量与人口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社会人口学则主要研究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大领域在实际研究中是密不可分，互相渗透的。本书着重介绍一系列国外社会人口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以开阔中国读者从社会人口学角度考察人口现象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本人是搞社会学的，而社会人口学所涉及的非人口变量，即社会、经济、心理、文化因素，正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方面的介绍过去较少且不系统之故。

然而，真要着手挑选出一二十篇论文以反映国外社会人口学自两次大战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来的主线，事情又变得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对战后世界人口学的进展影响深远的论著，或者因为技术性太强，需要一定的背景知识；或者因为篇幅太长，甚至是专著，都难以入选。还有许多是关于一些具体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往往需要对具体项目的一一定了解，才能领会其研究思路，这样一些文献，因为太专门，也难以包容在这本书中。更何况，战后世界人口学研究文献浩如烟海，我本人知识面毕竟有限，难以全面了解，因此，在论著的选择上就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无论如何，本书所选论文都是战后世界人口学中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论文的作者也均为世界人口学中享有盛名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中许多人都先后担任过世界人口学会 (IUSSP) 或美国人口学会 (PAA) 等重要人口学组织和机构的主席等领导职务。

本书所介绍的学说和观点，有些曾在国内人口学刊物上介绍过或提及过，但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和阅读英文原著的读者，仍难以得知这些学说观点的全貌。本书的宗旨是把这些重要论著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中文，以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直接地去理解、评价、借鉴、甚至批判它们，从而对人口学在我国的深入发展有所

贡献。因此，我相信，《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一书的出版，不仅有利于人口学教学的开展，而且对于一切希望了解国外人口学的成果，并致力于观察和认识我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动向，以推动我国人口学的发展的人们，都是会有启示和裨益的。

本书共选入了 17 篇论文，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面 7 篇属于总论，摩尔、戈兹切德等人从各个角度论述了人口学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对人口问题考察的一些总的思路。其中科尔和泰特尔鲍姆两篇则集中阐述了战后世界人口学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研究课题之一——人口转变理论。后面 10 篇属于分论，戴维斯、布莱克等人的论文涉及对生育、死亡、迁移、人口预测、人口政策、社会分层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生育方面的论文较多，共 5 篇，也是不奇怪的。因为战后世界人口呈增长总趋势，人口学家们自然地把研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于对人口生育行为的探讨，成为战后人口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领域之一。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基本上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八六级研究生班的同学们。他们在 1987 年春季参加了我开设的社会人口学课程，本书所选的内容大多由我在课上作了介绍。接着，在 1987 年秋季，在对人口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又参加了由我为编译本书组织的人口学讨论课。在课堂上，参加讨论班的同学分别就本书所选论文进行讲解，集体共同讨论，然后分头着手翻译。我考虑，在理解和掌握一定的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是保证翻译质量的前提。这些译文都附上了原著的参考文献目录，因为考虑到这些文献目录是论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不译成中文，是因为考虑到参考文献本来就是英文的，如果译成中文，反会给查找者造成困难。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苏阳、罗平、张微、卢启文、贺诵欣、杨捷、孙力、郑金福、毛慧娜、冯国忠、孙晓梅、杨鸽、鄂

盛明、李鲤、赵孟营、盛少波等 16 人，由卢启文、杨捷、盛少波和我等 4 人分别负责校对工作，最后由我通读定稿。在这里，我愿借此机会对参加本书翻译和校对工作的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至于文集中，无论在论文的选择或译文中存在的问题，责任当然在于我，这是理所当然的。

顾宝昌

1988 年 7 月

于北大畅春园

再序

这本书在 1988 年春天就已基本完稿了。但由于 1988 年夏天我受联合国之聘赴平壤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顾问，因而这本书的出版工作也随之拖延了下来。1989 年秋天我完成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回国后，即由北京大学调至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工作，这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参加人口学方面的会议和接触更多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实际，并使我更深切地感到，中国人口科学发展到今天，必须在人口研究思路方面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许多同志得知这本书已完稿的消息后，都纷纷向我打听和索取，希望它能早日出版。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

馆。作为一个享有盛誉、历史悠久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崇尚学术、兼收并蓄”的传统作风令人感动和钦佩。应该说，没有商务印书馆的热情支持，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吴衡康、王涌泉等同志的认真努力，这本书今天的问世则是不可能的。我也要感谢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对这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关怀和鼓励，特别要感谢张立平、王秋香、张景秀、齐国荣、史丽华、黄民检、刘卫红、梁心鉴等诸同志为本书书稿的计算机录入排版所作的辛勤劳动。最后，我当然要特别地感谢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田心源教授，他为本书所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文不仅点出了本书的宗旨，也无疑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顾宝昌

1990年10月

于大慧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为《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而作

人口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是曲折蜿蜒的。从本世纪初到承认“人口”是个问题的六十多年中，这门学科在高教研究机构中是忽现忽隐的。专门搞调查、分析和解释人口变动因果的阵容也是盛衰无常的。即在“人口”问题的定义和幅度上，见解也是反复波动的。这些往事是可以理解的。人口是政治、经济情况进退的主动变量，但也同时为政治、经济演变的被动变量。它们中双向相互影响是复杂的，也是极其微妙的。因而自古至今，处理人口问题之道经常是曲曲折折的。特别是在过去一些年代之中，中国的人口问题认识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极大。再加上国内政、经格局中的变动，人口学被封为“禁地”。其处境在一段时期中可说是“山穷水尽‘已’无路”的了！

可鼓舞的是，人口学近十多年在国内已大大地超过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运，并已广泛地取得了国内朝野人士的支持。当然，人口学的东山再起无疑地反映人口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标明了众多学者在已往、当前和将来人口动态趋势上兢兢业业地摸索出的成就，同时标明了中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举足轻重。国外学者和其它人士密切重视中国人口学日新月异的阵容也是必然之事。研究中国人口现象的成果不但有助于灵活地完善适用于国内的宏观实际人口措施，也有益于加深全世界在微观人口行为科学理论上的探索。中国人口学已有了一鸣

惊人的成绩，高速地跃入国际中引人刮目相视的地位、作出更大的贡献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人口学能获得惊人的成绩可归综于众多原因，主要的是，打破了“闭门造车”这个框框，辟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渠道，广泛地引进国外的人口分析程序和理论，接受了国际技术与经费上的援助，派送了大批人员外出吸取教研经验，邀请了国外学者直接介绍不同社会经济中人口情况研究的心得。学术交流无争论地是中国人口学崭新演变的高速公路。但在这个捷径上驾车前驱之时，除非认清方向、把握日程和准备精妥，否则耗时、费油、甚至被迫耽误进程都非意外之事。在这方面要提高警惕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外兴起的人口分析程序和理论是有其一整套的前提与内容的。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口现象内质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人口现象。人口现象包括生育、死亡和迁移。无论在任何社会国家之中，婴儿出生、生命终止或个体流动都是同一无别的“基本人口”现象。生、死、迁在中外是千篇一律的人生经历。但在数量上，这些现象在不同地区或年代中可能极不相似。一部份人口研究焦点即专注于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上的高低差别、升降快慢和这些基本人口现象中的内在关系。在这点上，人口学研究及其发展是和人口资料收集与整理唇齿相依的。数据质量的好劣会直接促进或阻碍人口学的进展和成熟。更主要的一事是，人口现象高低升降的前因与后果在不同地区或年代中会大有出入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外人口学的成就一是不外乎在因果这两个领域中理论探索和检验，二是针对这些国家社会内的人口现象变动而起家的。其目的通常不涉及普遍性的“人口规律”的创建。理论探索和检验的主要动机是测量与示明能解释人口现象高低升降的主动变量和其可能引起的影响。分析的目的和策略一般都以“中

幅度”理论为范。

这当然不是说，这套国外东西在分析中国人口现象上无用武之地。那是与事实相反之言。这只是指出在采用引进的程序和理论时，要彻底地摸清其中的背景与来龙去脉。要不然在应用上、解释上可能会文不对题或题下无文。比如，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能影响生育率高低升降的宏观“主动变量”为数众多，包括生产技术、能源、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等的差别。这些主动变量可能解释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生育率上的高低差别，也可能有助于了解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内不同地区间高低生育率并存的情况。可是在探讨一个发达国家内存在的生育率差别和波动时，这种宏观分析方式会给人有隔靴抓痒的感觉。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率在众多的欧美国家回升，不仅中断了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延续下降，并同时极快地跃回到了本世纪初的生育水平。但这种意外的回升持续20年左右，生育率然后又转低，接着再出现向上趋势。发达国家中的忽增忽减的生育波动显然不同于历史上从高到低的生育转变。这种生育行为虽仅为短暂性的升降，但极深刻地反映一般夫妇根据自身情况而采取的生育决定。宏观分析公式因而料理不清其中的算盘。面临这批二次世界大战后突起的生育现象，国外人口学者研究方式也随之转变。微观分析程序和理论循势纷纷而起。

惹人注意的创新通为人口社会学家与人口经济学家的贡献。读者会很快地在顾宝昌博士和他同仁选译的文章中，同他们提供的概念和理论逐一见面。他们的共同前提之一是，生育分析是行为科学的新领域。开发这个领域的策略与工具是根据微观性经济学、社会学理论铸造的。生育行为因而概念为“社会文化规范”或“经济利益得失”举动。“理想家庭”规模、“生育愿望”、“期望生育数量”、“儿女的价值”、“世代间的财富流溢”等等概念和论述普漫于

人口学调查报告与学术著作之中。

当然，人口学者之间对以经济观点来分析生育行为的策略也并非无争论的。比如，经济学者指称婴孩为“消费品”一举曾引起社会学者的反驳。即国外搞人口学的同行在事业上虽有同一的前提，但并非也不可能意见同一的。人口学的进展正是靠他们坚持争论而取得的。其中的枝节是众多的。但这里，应加重申清的一点是，当代国外人口学者设计的众多微观分析模型另有一个更主要的同一前提。

这个前提是，生育的高低升降是夫妇能自觉地采取决策的表现。决策的重要内容包括他们对自身当前和将来生活情况的估计与预测。这批估测概念可为分析生育行为中的“中介变量”，即众多的主动变量在生育上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必需通过中介变量才能发挥作用。夫妇生儿育女多少的打算不但反映他们成家立业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可根生于他们童年的情况与经验。微观分析模型中的“被动变量”，即生育行为的差别和波动直接地反映他们打算的落实。

当然，在生育上“夫妇自觉选择”的落实并非超社会规范的主观行为，而有其客观条件的。整个来说，经过长时期的演变，“节育文明”已是家喻户晓之识。同时，避孕技术与信息也已是满街遍坊之事。这就是说，微观生育行为分析模型的兴起与传播的环境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大有出入的。

首位突出差别是，在过去 20 来年中，计划生育是国家发展政策的三部分之一。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生育率却在极短时间内大幅度地下降。无疑地，在这空前的生育转变上，计划生育措施落实发挥了极大的诱催作用，即外在的因素高速地影响了夫妇间的生育行为。由是，在研究国内生育时，微观分析模型运用必需慎重从事。这并非是说，此种模型在中国人口学领域中施武

的机会仍是将来的事，或仅宏观分析为当务之急。一个极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生育率转变在不同地区中有其显著的差别。一般来说，较发达富裕的省市在生育下降幅度上占领导地位。这极可能是，发达富裕省市内的条件较成熟，“节育文明”较普及，因而在生育行为上，夫妇自觉选择性较高，避孕上有较积极的成就。微观分析在中国人口学研究中是有其一席之地的。

当然，从计划生育措施落实上来说，夫妇自觉地选择少生是一个重要关键。比如，近几年来，在讨论婴孩死亡、老有所养时，主要看法是，抓计划生育必需包括创建促进夫妇自觉选择的宏观条件。人口老年化、退休、老年保险之类问题的研究是与计划生育工作密切相关的。人口学者在这方面能够也应该作出伟大的贡献。同时，也需要注明的一点是，在人口现象研究过程中，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可各自而行的。但人口现象的转变或恒静（包括生育、死亡、迁移）实际上是宏观、微观因素合并影响的趋势或状态。人口行为（指生育行为、死亡行为、迁移行为）同样的有其宏观和微观变量内容的。

如前所述，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出现的人口现象和人口行为有其引人瞩目的宏观因素，也有其微观解释。人口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人口研究也是个举世关心的问题。因而，中国人口学者不但有一个在计划生育政策妥善和落实上起广泛作用的机会，同时，也有一个带头领导世界人口科学再上一层楼的机会。根据国内人口转变的趋势和国外人口学理论分析上的演进，中国人口学探索应走“多层分析”道，即分析模型建立在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结合上。

人口科学的进展根基于大批性质不同数据处理上。~~多层分析~~包括宏观、微观资料，研究过程更为复杂。~~电脑软件在这方面提~~供了具体的方便。但多层分析模型的设计仍然要靠人口学者个人~~个人~~

或共同的探讨才有门路。中国人口学者已经粉碎了闭门造车这个框框，也深领“无需重新发明车轮”一语。站在巨人的肩上是可看得高远的。顾宝昌博士和同仁忠实地把一批国外人口巨著译介给中国人口学界，在教研上大大地提供了方便。我衷心地、热切地恭贺他们“及时雨”的勤劳和永垂不朽之工。读者在翻阅学习这些著作时，也一定会有同感，并会得到深刻的启发，随之提出更新新的见解与理论来。

田 心 源

1990年5月20日
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社会学和人口学*

W. E. 摩尔 (W. E. Moore)

任何科学知识体系均沿依分化和交汇两条路线发展。分化的进行方式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有时甚至纯属偶然。分化而产生的各具体门类又必定相互交汇重迭。人们用这样营造的科学知识体系来对原本的客观真实世界作出描述。这样就可以超越惯常的学科界限，博采各家之长。学科的严格界线无须划定，管辖权上的争端无须评判，同时涉足众多学科的某一科学门类亦无须追究其归属所在。对诸科学领域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因此越发呈示其不同寻常的意义。

本文先将人口学这一科学门类当作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来讨论，又充分意识到它并不只属于社会学。然后，探讨社会学理论与人口学的关系，最后探讨人口学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

人口学是社会学的分支

人口学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数据体系和一套独特的资料分析技术，还有完备的理论和方法。尽管如此，它还是被看作其他学

* 本文译自《人口研究：回顾和评价》，P. M. 霍塞和 O. D. 邓肯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9 版。